

李后强:世界难题“巴蜀符号印章”在四川荣经求解

符号印是中国的文化特色。其中,巴蜀符号印章最为诡秘,被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或考古界的“哥德巴赫猜想”,至今无人破解。这类印章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印面所铸的主要是虎纹、手心纹、花蒂纹、卷云、水波和动植物等,而不是汉字(少数有混用),与中原玺印有很大不同。从 1954 年在四川昭化宝轮院出土巴蜀符号印章至今,在四川境内有 20 多处出土这类战国时期的奇特印章共计 100 余枚,地点遍及四川东西南北中。而在四川荣经县就出土了 80 多枚,最为集中和丰富,因此荣经县成为破解巴蜀符号印章的突破口和主战场。

巴蜀符号印章是指印面有巴蜀地区特有的图语符号的印章,其分布以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为核心区域。战国早期发现虽少,但已较为成熟,战国晚期形制多样化、复杂化。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大伦等在“考古视角下的巴蜀印章研究”一文中指出,巴蜀印章与墓葬的形制、大小、葬式、随葬品数量的多寡及种类、性别等无关,不是墓主身份等级、财富的标志,而可能是表示其所有者从事某种职业或具有某种技能。在各地出土巴蜀印章的墓中,多见铜饰件,其在未出土印章的墓中甚为少见,应与印章有关。高大伦等学者的观点,很有启发性。为破解巴蜀符号印章,我们用“还原法”(回到战国时期的经济社会状况进行思考)和“结合法”(把兵器与印章、符号与汉字结合研究),实际上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我们发现,巴蜀符号是一个“过渡图字”,既不是纯粹的图形,也不是纯粹的文字,正处于从图到字的转化过程中,相当于六七个月的胎儿,是中原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外域文化的混合产物,绝不是一种文字,因此印面图形类似“日语”,好像认识但又不知其意,既有汉字,又有外来语、“平假名”、“片假名”。世界上只有日语是混杂文字。从这点似乎可以推测,“日语特征”发源于四川特别是荣经的图语符号。“巴蜀符号印章”表示所有者从事某种职业或者具有某种技能,相当于今天的“驾驶证”“会计证”“工程师证”或者“工作证”等证件,有“王”字的印章由官方颁发,没有“王”字印章属于私人篆刻,类似闲章和肖形玺。由此,我们可以回答如下六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破解巴蜀符号?

原因在于研究方法有错误。一是从单一文字角度研究。过去几十年对巴蜀符号印章的研究,主要讨论其外观、形制,或研究图语符号的组合,或讨论图语符号是不是文字、如何释读,或从玺印的角度讨论其性质、功用、源流等问题。总是从一个方面去研究符号的一般文字意义,没有进行全面综合性研究,实际上这些印章是极端个性化的,每一个都不一样,图形具有特殊性、没有普遍意义,其功用就是私人印章、闲章,类似现在画家、书法家的个人闲章。二是用今天的高科技“互联网”思维去看待古人、美化古人。古代生产力极端落后,没有今天的手机和计算机,没有航天器和高速路。只要回到当时生产状况,我们就知道,三星堆青铜器立人的手势可能是划船(鱼凫氏)、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可能是“炉火烤鸟”(中间是炉火、周围是四只鸟),三星堆人物面部造型可能都是巫师面具等,这种解释当然会让许多人失望甚至生气!但历史真相不相信眼泪。三是人类都是从没有文字到有文字,次序是从图形—符号—文字。甲骨文是商朝(约公元前 17 世纪-公元前 11 世纪)的文化产物,距今约 3600 多年的历史。根据北京大学孙华教授对古蜀五个朝代的时间划分,我们认为,距今 4619 年至 4019 年前为宝墩文化(主要是蚕丛、夏早),距今 4019 年至 3819 年前为鱼凫文化(可能是柏灌、鱼凫,夏晚),距今 3819 年至 3219 年前为三星堆文化(主要是鱼凫,商代),距今 3219 年至 2919 年前为十二桥文化、金沙文化(可能是鱼凫、杜宇,商晚、西周),距今 2919 年至 2519 年前为新一村文化(可能是杜宇、开明,东周),距今 2519 年至 2119 年前为青羊官文化(开明晚期,巴蜀文化晚期),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朝代各数百年。金沙古城在距今 3219 年至 2669 年之间,主要在杜宇时代。在杜宇与开明之间发生了巨大洪灾,洪灾之后瘟疫灭了杜宇时代的金沙古城。巴蜀什么时候有文字?大禹夏朝(4089 年前)宝墩、鱼凫文化时期有图形,商朝(3618 年前)三星堆文化时期有符号,周朝(3064 年前)金沙文化时期符号向文字转变,但巴蜀符号没有来得及演化成表意文字,金沙古城就被洪水和瘟疫所摧毁,就被中原文化、楚文化同化,所以没有

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字体系。巴蜀符号是模仿自然现象(动植物、云水、山谷等形态)雕刻成的图纹,处于象形字前期,不是真正的文字(如殷商甲骨文)。因为在向表意文字进化中遇到了灾害和外来文化侵入,于是“夭折”,死于腹中而“流产”,这是西汉扬雄在《蜀王本纪》中说古蜀“不晓文字”的真相。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系统,无法书面传递和储存重要信息,公元前 316 年(开明时期)古蜀被秦国所灭。青川战国木牍(公元前 309 年,隶书)、达州渠县城遗址 15 枚竹木简牍,都说明秦以前巴蜀已经在使用中原汉字。古巴蜀没有自己的文字,而要用今天的汉字去解读,当然不会成功。



● 汉字“王”与图纹并用的巴蜀印章

第二,为什么巴蜀符号主要在战国船棺中发现?

印章是私有制出现以后的产物。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 770 年——前 221 年)是大分裂时代,大小国家有 140 多个(诸侯国),较大的有七个(七雄),百家争鸣,汉字虽还未统一,但各国的文字已经相对系统、成熟,加之青铜器的制作工艺也已达到较高水平,印章得到蓬勃发展,各类印章开始大量出现,承担了重要的社会功能。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争雄,战事频繁,有大量的文件情报传递,因此各地官员及权力机关需要独特的封缄形式来保证文件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这一类印玺用来钤在往来简牍的封泥上,材质多数为青铜,也有许多玉质印。战国时期广泛使用的印章,其质地、形状、组式乃至用字多寡、玺文排列等均无固定的模式。玺文为战国古文,用阴阳两法镌刻,结构多紧密,笔划圆转多姿,印面布局错落有致,和谐自然。今天能够确证的先秦古印多属战国时期,遗存官玺约有 6000 余方,分官玺、私玺两大类。官玺仅约 300 方,绝大部分是私玺。战国玺印是官吏佩带和使用的印章,那时已有拜官授印、辞官交印、罢官收印的制度,每官均有相应的官玺,以作为其身份等级及行使权力的凭证。遗存官玺有铜、玉、陶等质地,多数为铜质。战国私人印章,今遗存的铜质居多。铜私玺形制多种多样,印体有方、长方、圆、椭圆、半圆及心形、月牙形、矩形等不规则形状。组有鼻、亭、蛇、鸟、兽、带勾等式。私玺可分姓名玺、闲文玺、肖形玺 3 类。有的印面刻姓名,有的仅刻单姓或单名,玺文 1—4 字不等。姓名玺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姓氏,仅双姓就有近 50 种,不少姓氏早已失传,甚至有的姓氏文献中亦无记载。闲文玺或称成语玺。遗存闲文玺有 120 余种,重文者达七、八百万,分为①修身类:敬身、敬事、中正、上下和等,此类文字多出儒家经典,反映了儒家学说在战国时期的深远影响;②言志类:得志、便事得志(知)、王孙之右等,这类玺文表现出作者的某种情趣或志向;③吉语类:善、吉、富、宜官、千秋、万金、出内大吉等,这类玺文表现出作者对官禄、财富、福寿的向往和祈求。肖形玺就是印面多是单独镌刻图纹,也有刻图纹于玺文旁,作为玺文的装饰。肖形玺的形制与文字玺无别。阴、阳纹并见,多模铸,图象多虎、凤、鹿、独角兽等吉祥动物。在荣经县出土的巴蜀符号印章就有“王”“敬事”“富”“万岁”“可行”等汉字,这充分说明是战国私印而不是官印,属于修身和吉语类,因为拜官授印、辞官交印、罢官收印,官印不可能随葬。船棺是水运民族的习俗,四川是千河之省,因此四川盆地船棺最多。荣经县曾经是青衣羌国和岷山王国所在地,有青衣江、荣河与经河,古代蚕丛、楚庄王、安阳王在此劳作,所以出土“王”字印章最多。那些印章可能是水师、商号的标志。有印章的墓主不一定是官员,可能是工匠技师,但有船棺又有印章的墓主肯定是官员,主要是大商人、皇亲国戚。



● 钤为出土“王”字与图纹印章

第三,为什么在战国兵器上也有这些符号?

兵器与印章文化同源。经商与打仗一样。巴蜀古族(特别是巴賁人)善于打仗,曾经协助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巴人与蜀人之间也经常发生战斗。古时候的成都是兵器(青铜器)生产重地,主要在广汉、青白江一带。巴蜀符号主要分布在铜兵器、铜乐器、铜玺印等器物上。铜器是贵重物品,有钱人家才有,所以印章与铜饰件有关。典型的巴蜀符号是虎纹、手心纹和花蒂纹等,是巴蜀文字的前身。据推断,巴蜀符号产生于古蜀国开明王朝之前,在商(距今 3618 年)周(距今 3064 年)春秋战国(距今 2789 年)秦(距今 2240 年)时代处于演变之中。已发现的巴蜀符号“图语”超过二百多种,九成以上是刻在铜兵器上的,年代在公元前 9 世纪西周到公元前 1 世纪西汉之间。军人也是一种职业,就是打仗的人,士兵也可以带私人印章,更要带兵器。在青铜兵器上雕刻巴蜀符号是为了辟邪、祝福、打仗安全胜利,这是古蜀原始宗教的产物,尤其是为道教创立打下了社会基础。道教就发源于四川荣经县周边的瓦屋山、大邑鹤鸣山,道教画符特别流行。在荣经县出土的“成都矛”,有汉字“成都”和“公”,说明兵器不可私有,一定是公共财产。“成都”二字表示产地。兵器上的不同动物饰纹(虎、龙、鸟、鱼等)表示不同级别,权力大小不同,“虎”有调兵权。战国时代成都的漆器更有名,远销海内外,在江西海昏侯墓葬中都有。在荣经县出土的战国漆器上,就有“王邦”等汉字。商场如战场,也要“打仗”,因此商人要有标记符号,这就是印章。

第四,为什么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荣经县?

主要原因是,历史上的荣经是巴賁人所在地、是陶器发源地、是岷山王国和青衣羌国所在地、是古代铜器生产地、是古代邮传地(严道邛邛)、是古代商贸中心、是蜀秦古战场。印章起源于陶艺,最早由巴賁人所使用。中国陶器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有八千多年历史,而最原始的制陶即模制法,就是在模子里置竹篮条或绳子,接着用泥涂在模子里,待半干后取出,陶坯的表面就留下清晰的篮或绳的印纹。受此印纹的启示,先民们后来直接在陶拍上刻纹饰,这就成为我国装饰图案和印章艺术的渊源,陶经即由此脱胎而出。砬器与古城相生相伴。荣经砬器的历史远在宜兴紫砂之前。仅从秦惠文王建筑严道(前 312 年)算起,就有 2300 年左右的历史。实际上,荣经黑陶是 8000 年前古陶的活化石,在荣经最早出现陶印。秦代陶印与战国陶印不同,基本上都使用标准小篆文字,只有极个别留有战国书体的风貌。战国七雄烽火硝烟,严道古城偏处一隅,商旅往来增多,严道日新兴盛。考古专家发现,春秋战国时的陶器其原料、配料、器型、制作工艺已具备了荣经砬器的主要特征。西南民族大学王明亮在《巴蜀印章的出土及研究现状》一文中指出,1985 年在荣经同心村共计出土 42 枚巴蜀符号印章(现在有 80 多枚),是最为集中的一次。古严道城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牦牛道的起点。荣经古严道文化早于广汉三星堆文化。荣经最初居民是巴賁人及氏羌系统的徒、笮、青衣等族人和外来的楚人。春秋战国之际(公元前 770 年——前 221 年),楚庄王之后裔岷山庄王,约于公元前五世纪至四世纪,以荣经城为中心,由楚人建立了附庸于楚国的岷山王国。荣经县在岷山庄王管辖时代,水、陆交通十分方便,所以成为楚国从丽水地区运送黄金的转运站。公元前六世纪时,荣经便已是蜀国开明王朝的铜冶基地,同时也是开明蜀国的铜器、牦牛、笮马贸易的中心。从成都起经严道至云南,可直达缅甸北部,再转至印度。2004 年发现于荣经县的东汉“何君尊膝阉”摩崖石刻便印证了此路的存在,所以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阿富汗)发现蜀布和邛杖。《水经注》等史书记载,在秦军攻入成都之时,蜀王子安阳王率领 3 万蜀人,在严道古城与秦军大决战,突围而出,远遁越南,建立瓠雎国。从严道古城发现的春秋至秦汉的各类墓葬及出土文物主要有:大批青铜器、炊具、印章、陶器等。荣经曾家沟战国墓群出土了一大批漆器(奁盒、扁奁、耳杯、剑),木器(梳、篦、杖),陶器(罐、釜),竹器(筥、篋)等。发现的漆器填补了四川作为漆器生产基地而未出土实物证明的空白。其中一件漆奁盒上刻有“成草”二字,经专家鉴定,成都在得名前,就有“成草”、“成亭”之称,为成都得名的演变过程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同时说明荣经与成都关系很紧密。荣经符号印章就是军人将士、制陶技师、

铸矿工匠、邮传工人及商人的证书,是身份和技能的标志。



● 巴蜀符号印章

第五,为什么许多巴蜀符号印章都有“王”字?

这应该是官方颁发印章的标志,私人自己雕刻的印章没有“王”字。这种印章是从从事公务活动的人拥有的私章。1956 年,在广元宝轮院船棺墓出土的一些方形铜印上,有“王”字,非常醒目,就是汉字。1964 年,成都、重庆出土了一些更为神秘的印章,这些印章左右有两个并列的“王”字;1992 年什邡出土了一枚印章,印背却印了四个汉字,其中可以明显看到“十”和“王”字;1997 年,犍为五联乡战国晚期 5 号墓出土了 3 枚圆形印章,其中一枚印章上刻着两个左右并列的“王”字,但其中一个“王”却是侧着的。有人推测,会不会有刻着三个甚至更多“王”字的印章?考古学家发现,刻有两个“王”字的印章很多,这似乎是印章的最高“规格”,超过两个“王”似乎意味着僭越。“王”字多少代表什么意义?应该表示身份级别和职务高低,越多越尊贵。巴蜀统治者和中原王族对“王”有着共同的兴趣,在表达王权、显示尊贵上取得了一致。战国时期的巴蜀印章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在古蜀开明王朝时期,汉字已经从中原传到了巴蜀,和巴蜀符号一起成为重要的交流工具,并且出现了交叉混合使用的情况。

第六,荣经巴蜀符号印章究竟包含什么内容?

1981 年,荣经烈土乡战国墓葬出土的一枚印章上,印有汉字“百”。后来还发现有些印章印面有“富”“月”“田”“十”“心”“万岁”“敬事”“可行”等汉字。更有意思的是还有汉字“铎”,这是古代宣布政教法令时使用的印章,说明与政府、宗教有关。除开汉字外,印章上其他的符号是什么意思?至今还是个谜。四川凉山两位彝族古文字学者胡成荣和窝底子研究发现,三星堆 62 个神秘符号是古彝族文字,并进行了解读,这是重大贡献。许多学者认为巴蜀符号是带有原始巫术色彩的符号。有的说巴蜀印章可能是一种边关使用凭证,有的说印章不过是古人的腰间饰物……另一种说法是巴蜀印章具有军事用途,因为在严道古城遗址周围的军事墓葬里,与巴蜀印章一起被发掘出来的还有大量青铜兵器,兵器上也有类似的神秘符号。现存中国铜印的发端是商代晚期的“亚罗示”玺(现存台北故宫

博物院),“亚罗示”是晚商一贵族的族氏及人名,相似的铭文可以在晚商时期的青铜器上找到。先秦时期使用印章作为个人和社会机关的信凭印记,官印的数量要远远大于私印,在民间还并未广泛普及。至汉代,印章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不仅是贵族和官员群体使用,社会应用也变得更加广泛,这就导致了印章从信凭工具向艺术品的转变。

符号是象征物,也是一种载体,承载着交流双方发出的信息。荣经县博物馆标记 LOGO 就是一枚巴蜀符号印章。其中有一个“王”字,还有尖形 S、五星、七星、~、9 等符号。我们认为这是一枚“公务员”的私章,因为有“王”字。其他符号是用自然形态表示自己的愿望,保佑自己或亲人。尖形 S 表示 2 字,意思是双方、阴阳、合作、天地等,是太极的原始图形,做生意就是合同、契约。“五星”是魔法符号,表示太阳、生命、健康、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七”是大自然创生的基石,“七星”表示星辰、周期、“北斗七星”、方向、指南针。~ 形,表示水波、船工、职业。9 形,表示虎尾、卷云、天上。荣经县博物馆 LOGO 的含义就是“为国家做水运,昼夜风雨兼程,上天保佑,健康平安归来”。这枚印章实际是“劳模”证书,技师证书。这些印章是青铜器中的小不点,大似铜钱,小如纽扣,最重几克,主要便于携带和远行。活人把印章拴在裤带上,人死后随葬,放在腰部,表明是重要物件,随手可拿。在荣经县古蜀符号印章中,还有“手”“心”“月牙”“树木”“凤鸟”“三角”等符号,我们认为“手”表示做事、干活。“心”表示良心、爱心、思念、忠诚。“月牙”表示公正、清廉、明察秋毫。“树木”表示大自然、生长。“凤鸟”是中国传说中的神鸟,《山海经·大荒西经》有记载,凤鸟:指凤凰,帝舜时和周文王时都曾出现,预示着时代的兴盛、事业的成功。“三角”尖端向上表示男性,尖端向下表示女性。可见,荣经巴蜀符号是借助大自然表白自己愿望的图语。这些印章中多数是铜铸(荣经是铜产地),形状多数为圆形,少数为方形、矩形、半圆形、椭圆形,个别为“山”字形或月牙形。生动而具象化的印面,几何线条分明,图案对称,传递出古人讲求和谐统一的思想。一幅幅生灵与天象对话的抽象的古老的印面,隐藏着多少历史信息,值得深思。

总之,我们认为“巴蜀符号印章”是私人物品,表明主人身份和职业技能,极具个性化,图纹没有一般性。印章符号是混合图文,是处于过渡态的图字,是中原汉字与巴蜀图字的混用,类似于日语的外来文字与假名的组合。古巴蜀文字受自然灾害和外部文化侵入而胎死腹中,这是古蜀国被灭的重要原因,因为缺乏传递和储存重要信息的符号载体。荣经县是古蜀王战斗的地方,严道古城的陶器、铜器、邮传、商贸、茶叶、水运等历史悠久,毫无疑问成为巴蜀符号印章出土的集中区和富集地。

(李后强,四川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 荣经县博物馆 LOGO



● 荣经县博物馆 LOGO

一
庭中几处红?
叶底壁前笼。
不是春来早,
新妆未路冬。

二
城中车渐少,
各赴自家年。
只为春节后,
重逢再关闭。

春节序曲 ■ 陈阳

三
座上分身欲,
心兼二意忙。
急得随便睡,
罔顾日头长。

四
五
霜晨何用惧,
院跑只谈圈。

七
新书守岁伤,
羞剩几多章。
只怨新春近,
抢晴如意郎。

六
弟把乡情寄,
萍思岁岁新。
山村长有忆,
少壮老仍亲。

八
岁尽意无邪,
春来梦已觉。
千山披万色,
一镜怎能赝!

(作者简介:
陈阳,男,土家族,
现供职于中国电
信四川公司。热爱
文字,尤好诗词,
作品散见于星星
诗刊、四川日报、
福州日报、剑南文
学、西南作家等媒
体。

春花三弄 ■ 周文圣

看花
明日看花去
梅树花前过

沐浴试新装
宜着白衣裳

桃红李白有空枝

惜花
万紫千红眼迷离
春风乱怀香满衣
百花深处君莫入
芳草最能绊马蹄

怨花
江南二月春应早
细雨纷纷花忽迟
东风若不偷闲去